

【农业部门经济】

国际粮食体系的危机与重建

许 准

【摘要】粮食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活和生产资料,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梳理了世界近现代的粮食问题,利用多个角度的历史数据分析了19世纪末期以来的几次主要的世界粮食市场危机的成因和影响,并着重突出了国际粮食体系的概念。粮食体系包括粮食的生产、分配与交换关系,从属于总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现代社会的发展伴随着国际粮食体系的危机与重建,这个过程过去没有,以后也难以真正解决全球的粮食问题。世界需要探索新的可持续的粮食方案,而中国可以提供自力更生的宝贵经验。

【关键词】粮食危机;粮食体系;资本主义

【作者简介】许准,纽约城市大学John Jay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副教授。

【原文出处】《政治经济学评论》(京),2024.1.203~220

一、资本主义的粮食问题

回望数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其最引人注目的成就自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极大解放。我们可以重温《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段经典论述:“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①

然而这种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并不是某种抽象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凭空呼唤出来的产物,而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成果。举例来说,当新兴的城市工业资本开始扩大生产性投资、雇佣更多的自由劳动力的时候,企业主们也需要考虑到市场上的原材料供应情况,尤其是粮食成本,因为这正是维持无产阶级劳动力再生产的核心要素。在给定其他条件的情况下,粮食成本越高,劳动力的市场价值可能就越高,而这会对资本的积累速度甚至利润率产生不利影响。如果一个国家的内部市场无法供应足量的粮食,或者粮食价格太高,无疑就会使得该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陷入停滞或者危机。

同时,粮食作为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在国家治理当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同样作为生活资料,纺织品等轻工业产品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其需求弹性远远大于粮食。一旦粮食不能够充足供应,整个国家的运行也会受到极大冲击,资本积累更是难以正常开展。在2010年左右所谓阿拉伯之春的中东地区社会动荡里,粮食问题就扮演了中心角色。比如,埃及虽然长期经济表现尚可,但是其粮食高度依赖国际市场,2010年其谷物类消费有48%需要进口,^②而那段时间也正值国际粮食市场危机,粮价大涨,传导到埃及国内,至少是严重加剧了已有的社会矛盾。

在历史上,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带来了资本主义,也带来了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以及对传统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这些变化都意味着大量的农村往城镇的人口转移,大量人口脱离农业生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往往会创造大量的对粮食的新需求。这种需求的持续扩大,就会给本国粮食保障和资本积累产生一定压力。这种压力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里间断性的水患或其他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粮食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与粮食存在辩证关系:一方面,现代社会的粮食问题,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产物;另一方面,这种粮食问

题一旦产生,又会对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当代世界,粮食生产的一部分依然是在小生产中完成的。根据有关研究,30亩规模以下的小生产者占据了农田的大约24%,贡献了超过30%的世界粮食产量。^③但是很显然,哪怕假设小生产带有自给自足的特点,绝大部分的粮食生产也是由大生产者控制的,这些自然是市场导向的。这种主要以市场为导向的粮食生产,也是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给现代粮食贸易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一开始就与世界市场的产生和区域性劳动分工息息相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地区性的生产和消费出现了分离,因而出现了专注于市场销售以及出口的粮食产地的可能性。比如说,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首先形成的分工就在西欧与东欧之间,西欧得以开始发展制造业,而东欧则逐渐成为西欧资本主义的粮食产地,这也为日后欧洲内部的地位分化奠定了基础。

那么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发的国际贸易是否能够有效解决粮食问题呢?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如同其他的资本主义部门一样,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本身在空间上就是极不平衡的,从而粮食贸易也是极不

平衡的,随着资本积累的展开,这种不平衡还会出现巨大的变化。我们可以从图1当中看到一点端倪。图1展示了1961年和2011年的全球五大洲的谷物净出口。在2011年,亚洲和非洲两个人口众多的大洲总共进口了1.5亿吨谷物,同时美洲和欧洲一起出口了差不多数量的谷物。因此,从地缘的角度来看,世界粮食贸易的主线是从美欧流动到亚非。换一种略微简单化的说法,那就是世界上的粮食主要是从发达国家流动到发展中国家。然而,仅仅50年前的1961年,世界粮食贸易的格局还不是如此,如图1所示,当时欧洲是最大的粮食进口地,而非洲和亚洲尚能基本自给自足。在这短短的半个世纪之中,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发展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粮食的格局,而发展中国家对于进口粮食的依赖越来越严重。

由此可见,贸易数额的增加,本身并不涉及粮食问题,而是把问题“外包”了。此处的关键在于,这种外包方案,是不是一种长期内可靠的办法?当然,粮食贸易肯定是有用的,但是在生产和分配极度不平衡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依靠贸易来解决饭碗问题无异于不停地走钢丝,在某一刻一定会掉下来。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对于外来口粮的依赖越来越大,但是世界的粮食生产带有无政府性,并没有统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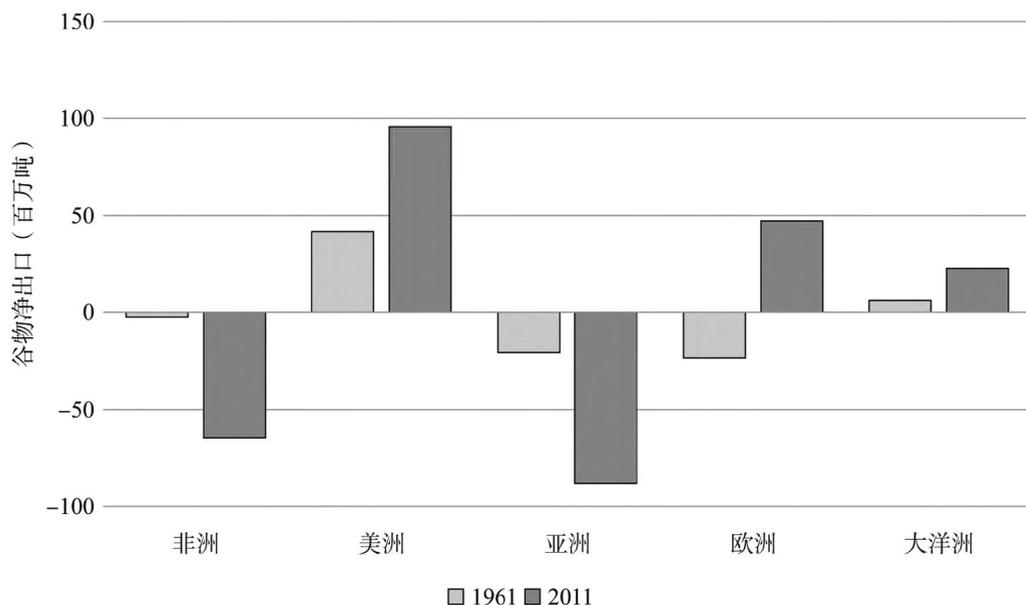


图1 世界谷物净出口分布

注:数据单位为百万吨,此处谷物不包含啤酒类作物。

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计划和调配,所以,根本就没有政府或者组织能保障发达国家的粮食出口就一定满足发展中国家在特定时刻的需求。可以说,稍有差池,就会在国际市场上引发风浪。正如我们在下面要详细分析的,这恰恰就是资本主义长期无法摆脱的粮食困境。

我们在此文中,把世界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的主导粮食生产、交换、消费的种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安排称为国际粮食体系。在农村研究文献中,对于世界范围的农业体系也称食物体制(food regime),本文关注的是更狭窄的粮食的问题。^④一个运转良好的国际粮食体系能够给世界资本积累提供相对稳定而低廉的食品,从而推动资本积累的进行。而粮食体系的危机,也会给资本正常积累造成极大困难。研究者可以通过分析粮食体系的运转和周期,来更深入地理解世界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变动和危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大部分时候都居于国际粮食体系之外,这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领导层对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分不开。然而,从长期的视角来看,如何在中国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合理地解决粮食需求增长的问题,而不是如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陷入国际粮食体系的漩涡中,仍然是政策制定者与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本文剩下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通过历史数据介绍和讨论粮食体系的兴起和数次危机,尤其是为何在20世纪中后期开始粮食体系愈发易于出现问题;第三部分分析21世纪的世界粮食状况及最近若干年的危机爆发;第四部分对资本主义的粮食问题进行反思并简要讨论中国的情况;最后一部分做出总结。

二、国际粮食体系的兴衰

英国作为最早发展起工业资本主义的国家,本身也长期受粮食制约之苦。^⑤根据学者的研究,英国在1700到1850年之间的谷物产量平均每年不过增加0.27%,这就意味着,英国在其漫长的工业化过程中,难以满足自身的粮食需求。^⑥对差不多同一个历史时段,也有经济史家得出了英国粮食产量每年增长0.5%的结论,但是这个产出增长水平依然远远不

足以满足工业化的需要。^⑦因而,英国从1800年左右开始,从一个过去17、18世纪长期的粮食出口国,迅速转变为一个主要的粮食进口国。

恩格斯很早就对这个转变有过敏锐的分析:“在上一世纪中叶以前,英国的谷物几乎每年都有输出,而很少需要从国外输入。可是从那时起,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当时的条件,谷物价格必然低廉,另一方面,由于肉类价格昂贵,许多耕地变成了牧场;同时,具有重大意义的机器发明,正在这个时期推动了工业空前未有的发展,而人口也有了空前未有的增加。于是,英国不得不首先取消粮食输出,最后甚至要求从国外输入粮食。”^⑧

输入粮食影响到了英国土地贵族与工业资本之间的利益分配。有关粮食的争论和社会斗争,可以说也贯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成熟时期。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围绕英国《谷物法》的斗争:英国从1810年代李嘉图时期开始在土地贵族的推动下设立对粮食进口的限制,进而推高国内粮食成本,到1840年代在工业资本家的协力之下废除。

《谷物法》的废除意味着英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彻底战胜了土地贵族,胜利的资产阶级开始积极开拓海外粮食产地,以满足国内增长的工业人口的需要。从进口粮食的比例上说,英国在19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候,不到10%的人口是依赖外国粮食维生的,而在1850年代之后,这个比例一直上升,到了一战前夕,已经是将近80%的英国人口需要靠粮食进口才能吃上饭。^⑨

这个过程也就是国际粮食体系形成并巩固的第一阶段。英国在这个时期成为主要的世界粮食进口国,而东欧与美洲成为对应的出口方。后来,美洲和其他殖民地的粮食出口逐渐取代了东欧的传统地位。在1860年代,大概有一半的英国的小麦进口都是来自沙俄和德国,而美国等地贡献了约三成。在这之后,随着德国工业的崛起,德国逐渐不再是一个重要的粮食出口方。在一战前的20世纪早期,欧洲大陆唯一重要的粮食出口国就是沙俄,它供应了英国大约15%的小麦进口,而美洲(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则提供了60%。^⑩

这个以英国为中心的粮食体系一直平稳运转到

了一战,在这之前的相当一段时间,世界粮食市场实际上维持了相对稳定和低廉的粮食价格。图2展示了从1800年到2022年的粮食实际价格数据。需要注意的是,此处实际上包含三段不同来源和处理方法的数据。对于1800年到1913年的数据,我们采用了罗素(Rousseaux)植物产品价格指数,这个指数基于当时主要的国际交易中心也就是英国的市场,主要涵盖谷物,然后结合相应的主要工业品的价格指数来得到一个实际价格指数。^①对于1900年到1986年间的数,我们主要采用了格雷力(Grilli)和杨(Yang)编制的国际食品贸易价格指数,并用同时段的工业品价格指数平减。^②而1987年-2022年的数据,则是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编制的全球食品实际价格指数。由于数据本身的限制,这三个时段不适宜于直接比较,但是作为一个总体趋势,可以比较可靠地展现历史长时段里的主要粮食实际价格(或者说与工业品交换的比值)波动信息。

根据图2的长时期历史数据,我们可以仔细探讨过去200余年的国际粮食市场状况。在整个19世纪的前半叶,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都维持在一个较高的位置,而从英国废除《谷物法》开始,如上面所论述

的,食品价格在低位实现了较长时期的稳定,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一战开始,到此就是国际粮食体系的第一阶段。在一战以及后续的混乱状况稳定之后,从大约20世纪20年代开始了新一轮长期的粮食稳定,中间虽然经过了大萧条和二战等波动,但是总体上看,国际粮食体系基本维持了稳定局面,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主要粮食市场危机的发生,这一个阶段可称第二阶段。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说是处在国际粮食体系的第三阶段中。在每一个阶段内,世界资本主义都客观上形成了一套有效的运行法则来引导粮食的生产和贸易,从而能够长期维持粮食价格的稳定。正如任何一种制度或者广义的生产关系的变化,粮食体系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自己的内部矛盾,到了矛盾激化爆发之后,各种政治经济力量往往是在应对上一期矛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下一阶段的主要制度安排。

在一战以前,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粮食体系至少是部分地依赖于欧洲的粮仓,也就是沙俄(包括今天的乌克兰地区)。而一战的爆发首先是导致传统的贸易通道被阻断,英国无法方便地获得来自欧洲大陆的粮食供应。在其后,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进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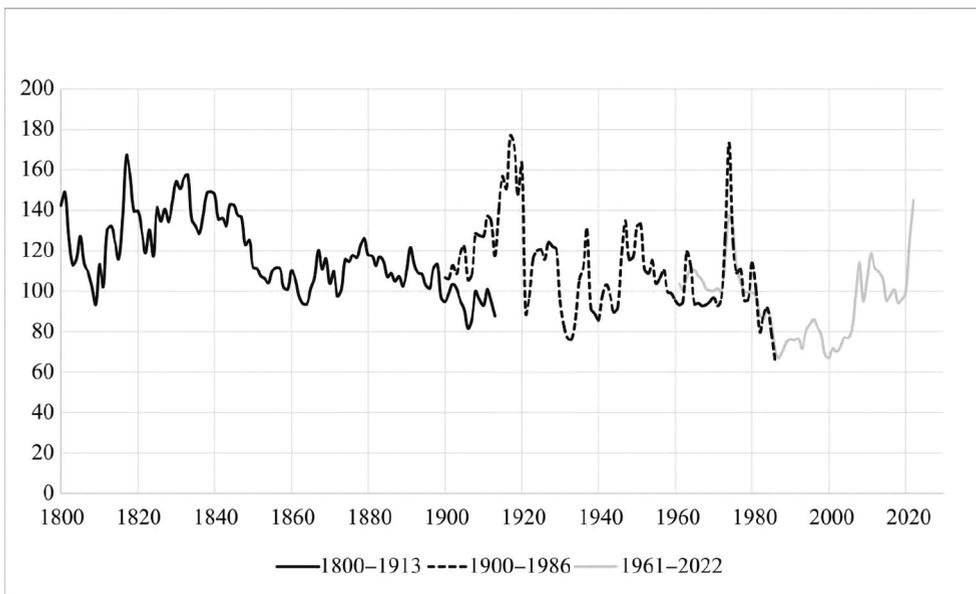


图2 国际实际粮食价格指数(1800-2022)

数据来源:1800年-1913年间数据来自Rousseaux植物性产品价格指数,用同期工业品价格指数平减,此处Rousseaux指数以1865年和1885年的平均值为基准计算。1900年-1986年间数据基于Grilli and Yang测算的食品价格(GYCPPIF)和工业品价格(MUV),以1977年-1979年为基准。1961年-2022年间数据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以2014年-2016年为基准, 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foodpriceindex。

开始数年的内战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整个粮食市场情况自然出现了大的变化。这种传统出口大国的突然“脱钩”,可以说是在较短的时间里促成了之前英国中心的粮食体系难以为继。

从一战期间开始,美国就开始有意识地挑起支撑国际粮食体系的政治重担。在彼时欧洲各国硝烟弥漫,而美国积极给英国供应粮食,逐渐补上了俄国的空缺。从1914年到1918年,美国向英国出口了1100万吨小麦,占英国小麦进口的一半。而在战后重建时期,从1919年到1926年,美国还给欧洲供应了623万吨食品。^⑬美国的政治意图是明确的,当时美国的食品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是后来担任总统的胡佛,他宣称,美国的目的是打击欧洲的饥荒和无政府(革命)这两个敌人。^⑭

美国是如何能够挖掘自己出口粮食的能力的呢?一方面,美国政府从这个时期开始对农业进行高度的干预,给予农业生产者大量补贴以鼓励生产,后来制度化为一系列法案和公司;另一方面,则是干预本国的粮食消费,比如动员美国人进行各种节食行动等。^⑮这些行动是颇为有效的,美国短期内就积累了大量的出口粮,为了消化产能,胡佛甚至把粮食卖给了他痛恨的苏俄。

美国对粮食问题的高度关注和干预,以及以粮食为武器稳定欧洲局势,预示了一种不同于之前的新的国际粮食体系的产生。这种新的粮食体系在二战之后才真正全面地展现出来。这个时期的一大特点,就是国际上出现了很多取得独立不久的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在二战后的重建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但是美国在对待欧洲和前殖民地国家

上,却又有大的区别。对于欧洲,美国的方针是著名的马歇尔计划,基本上是按照美国的模式重建了欧洲的粮食供应体系,实际上就是拿出一部分剩余来补贴农业,从而实现较高的粮食产出。而对于第三世界,美国的方针则是国际粮食援助,而非重建其农业,这些粮食援助的主要功能就是给这些国家提供大量的廉价粮食,而这些国家自己的粮食生产自然就受到打击,从而逐渐变成依赖粮食进口。^⑯

然而,战后粮食体系本身就蕴含了危机的因素。在发展中国家,国际粮食体系打击了这些前农业国养活自己的能力,而这些国家在美国廉价粮食的推动下出现了迅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提高作物单产的绿色革命,但是这种技术变革没有改变发展中国家依赖粮食进口的局面。美国等国的粮食出口能力虽然巨大,但是新的需求增长得更快。表1列出了各个主要地区的谷物净出口状况,可以看出,在20世纪60和70年代之间,尽管美洲的谷物净出口增长了约85%,东亚的进口则是翻了一番,而非洲更是翻了两番。

这种紧平衡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被新的变化打破了。战后的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其核心苏联基本上独立于当时的国际粮食体系之外。苏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实际上类似于过去的沙俄,扮演了粮食出口国的角色。正如表1所示,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谷物净出口基本上能够满足整个非洲的进口需求。然而,苏联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建设所谓福利国家,大幅提升了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实质上就是快速过渡到西方式的以肉蛋奶为基础的食品消费模式,这种转变对苏联的粮食状

表1 每十年年均谷物净出口

	北美	西欧	东亚	非洲	苏联	俄罗斯
1961-1970	51138	-7521	-16780	-3182	2438	
1971-1980	94695	-1509	-32987	-10445	-13550	
1981-1990	116912	16446	-49774	-24541	-35161	
1991-2000	105841	30138	-49220	-33747		-7745
2001-2010	100233	23301	-42858	-50713		10523

注:数据单位为千吨,此处谷物不包含啤酒原料。数据截断在2010年粮食危机。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10年之后开始逐步采用新的统计方法,故本表不包括之后的数字。俄罗斯的数字是从1992年开始的。

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www.fao.org/faostat。

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⑦饮食的升级对于间接性的粮食消费,也就是饲料粮消费的供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这个背景下,苏联不得不迅速深度融入国际粮食体系,并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一个主要的进口国。苏联的福利国家建设对于国际粮食体系无疑构成了一个长期性的挑战。根据统计,尽管英国比苏联的收入高得多,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人均的肉食消费量却超过了英国。^⑧与此同时,苏联的人均热量摄入也已经达到了美国的水平。^⑨也正因此,苏联的谷物进口增长很快,迅速超过了非洲和东亚的进口量。

苏联的意外入场,无疑是20世纪70年代国际粮食体系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新的粮食大额需求给当时的紧平衡带来了巨大冲击,粮食价格则是如同一战时期一般出现了大幅度上涨。这种危机也就实际上意味着以美国为出口中心而建立起来的国际粮食体系第二阶段难以按照原样维持下去。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70年代的巨大波动之后,国际粮食市场似乎又逐渐回到了平稳状态,而且这种平稳状态一直持续到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这种将近30年的平稳状态,意味着国际粮食体系经历了一系列调整之后,形成了一段时间里颇为有效的运转办法,也就是维持至今的国际粮食体系第三阶段。跟之前的阶段过渡不同,第三阶段没有出现中心的明确转移,但是做出了如下重要调整。

首先,美国大幅增加了其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供应,同时更重要的是,长期依赖粮食进口的西欧地区转为自给自足,并开始出口粮食,从资本主义出现以来的趋势在这里出现了反转。这里的核心因素就是美国在战后对于西欧农业的重建,这使得西欧复刻了美国模式,以补贴和干预的方法大大提高了其粮食供应。根据表1,苏联带来的大部分冲击就被西欧新增的供应所抵消了。其次,苏联自己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初红旗落地、国家解体之后,原苏东地区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出现了广泛的贫困化现象。原有的福利国家体系没有了,其支撑的高粮食需求也就随之消失。这就导致,苏联地区,如俄罗斯等,大幅度减少粮食进口,并在21世纪开始大规模出口粮食(见表1)。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出

口并不是基于俄国粮食生产的真正提高,而是本国消费被压缩。这样的变化,使得国际粮食体系再一次实现了相对长期的稳定局面。

从上面长时段的探讨可知,二战后得到巩固的美国中心的国际粮食体系一开始就包含了不可克服的矛盾。美国因为资产阶级国家的干预,使得自己有了剩余粮食需要倾销。这种廉价粮食销售到发展中国家,稳定了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局面,却也使得这些地方难以发展出自己的粮食生产能力,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需要粮食进口。只有在少数国家的剩余粮食供应高于或者等于发展中国家粮食需求的时候,这种国际粮食体系的紧平衡方能维持。然而,这种平衡的打破也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一旦有新的需求因素出现,比如苏联人民的生活条件改善增加了粮食需求,那么这个体系就不免出现大的波动。因此从根本上说,世界资本主义走出20世纪早期的粮食危机从而拯救自身的解决办法,到最后又成为威胁资本主义稳定的因素。

三、21世纪的粮食危机

我们现在可以对当代的国际粮食体系第三阶段做一个更细致的探讨。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个阶段的粮食体系依然保留了第二阶段的核心特点(以及矛盾)。尽管西欧的供应增加,以及苏联地区的消费降级使得体系得以稳定运转,但是其不稳定因素也很明显。从根本上说,这个体系仍然不具有长期吸纳世界新粮食需求的能力。由此而言,粮食体系第二阶段的危机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而是以种种方法被推迟了。

这种潜在的危机趋势,可以通过以下两组趋势来观察。首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进而也出现了向西方式消费过渡的倾向,这可能是这些地区进口粮食需求持续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如表1所示,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非洲和东亚的谷物净进口已经跟整个北美的净出口持平。其次,国际粮食体系出现了明确地去中心化的迹象。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影响力有着长期的下降。在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中,美国一国就供应了全球谷物出口的大约一半,哪怕到了21世纪初期,美国依然占据全球谷物出口的大约三成。但是这个比例在持续下

降,到了2010年左右的新一轮粮食危机时,美国只掌握了全球谷物出口的二成,而且这个比例还在持续下跌。^③以小麦为例,到了2021/2022贸易年度,美国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例只有一成左右。^④世界粮食体系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这也是自英国中心体系开始以来所未有的情况,在这里我们不去讨论去中心化本身的利弊,但是简单地说,在这种情况下,粮食体系进行有效的组织和应对粮食问题的能力可能被削弱了。

如图1所示,在2010年左右出现了新一轮粮食危机。学界讨论中指出的一个重要的危机因素,就是在21世纪,大批的粮食产地被转为生产生物燃料,这种燃料需求对于粮食生产的压制,使得全球本就有限的粮食出口能力更进一步被削弱。^⑤因此,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仍然在上升;另一方面,传统出口国的出口下降,再加上气候因素、金融投机以及全球范围的粮食库存下降,催生了十多年前的这次粮食危机。

这些证据说明,哪怕是粮食体系经历数十年的修复之后,2010年左右这次危机仍然延续了70年代危机的主要逻辑。而且,如果说70年代危机之后,国际粮食体系在较短的时间里就恢复了相对低价,展现了体系的韧性,那么,2010年左右的国际市场则没有表现出这种迅速地回归,而是在相对的高价徘徊了数年,这意味着体系自我修复能力的衰减。而到了疫情以来,尤其是俄乌冲突开始之后,国际粮价更是再一次猛增,目前仍在进行中。从各种迹象来看,国际粮食体系第三阶段实际上在2010年左右的危机之后,一直未能摆脱不稳定状态,加上现在正在进行的波动,或许准确地说,我们正处在第三阶段结束而新的国际粮食体系尚未建立的混乱过渡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国际粮食价格曾经一度有了稳定下降的趋势。这背后的驱动因素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美国和巴西等国生物燃料的生产增长放慢了。比如说,美国生物燃料的生产在2001年和2011年之间年均增长24%,但是在2011年到2021年间,这个增长率已经剧烈下滑到了1.5%左右。^⑥第二,欧盟(主要是指西欧国家)和苏联地区(主要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大幅增加了其粮食产

出和出口。比方说,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国的小麦出口在2021/2022贸易年度达到了将近5200万吨,比这两国十年前在2011/2012贸易年度的出口量翻了一番还多。^⑦俄乌两国在当前的冲突爆发之前,已经能够在小麦出口方面与美国加上欧盟持平。以单个国家来计算,无疑俄罗斯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粮食体系的最大出口方。

在整个世界政治前景愈发不明朗的现在,鉴于俄与西方可能会形成长期对峙的局面,俄乌两国占据了如此重要的粮食供应地位,而美国的重要性却在不断降低,这些因素总的来说只能说是增加了国际粮食体系的不稳定性。哪怕暂时不考虑长期的地缘政治因素,单就俄国内情况来看,俄长期出口前景仍然不是那么确定。尽管俄罗斯近些年的产量赶上甚至超过了苏联解体前的产量,但是俄现有的大额出口的基础仍然是苏联解体之后出现的大规模消费紧缩。^⑧这也就意味着,一旦俄社会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发展,民众的消费水平再次提高,俄能够把大量粮食供应出口的局面就会如苏联晚期一样出现大的变化。

除此之外,还有若干长期的供给因素会对新的国际粮食体系的形成产生限制。比如之前已经提到的,北美地区的粮食净出口在长期中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广大发展中国家无疑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但是这些潜力的实现,也需要大量的投资、社会组织动员以及政府的合理政策支撑。但是这些在现阶段是否能够实现依然具有不确定性。与此同时,我们要充分考虑过去一个多世纪逐渐形成的依靠化石能源而发展起来的能源密集型现代农业,本身就不是可持续的。^⑨化石能源,以及其产品如化肥、农药,虽然对粮食生产做出了明显的贡献,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土壤退化和污染问题。在全球气候变化和极端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现在,绿色革命所依赖的人工灌溉体系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这些因素实际上给未来的全球粮食生产设定了一个生态限度。^⑩

固然,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些乐观主义的言论,指望人类的科技进步本身来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粮食问题。但是问题在于,人类早就能生产出足够养活所有人的粮食了,纯粹的技术并不是让人类面临

粮食问题的根源。正如文章前面就提到的,现有的粮食问题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以及不合理的世界劳动分工状况的一个附属品。哪怕就是谈具体的技术,现在从整体来看,进步的空间并不大。比如说经常有说法认为转基因粮食可以彻底解决粮食问题,因为可以带来单产增加或者农药使用下降等好处。但是这些好处在实际中可能没有那么大,比如《纽约时报》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过去二十年,不使用转基因技术的西欧的单产达到甚至超过了主要使用转基因技术的美国和加拿大。^③而在美国,尽管使用转基因棉花减少了针对某种虫害的农药使用,其他的次生虫害却顺势而起,所以总的农药使用并没有下降。^④这里还没有提到转基因技术可能带来的其他生态和社会问题,比如所谓超级杂草,以及压榨小生产者的经济空间等。^⑤从总体来看,指望某些新技术来解决资本主义内生的粮食问题,不仅达不到效果,恐怕还会产生新的问题。

由此可见,在国际粮食体系第三阶段也看起来走向末期的当下,究竟在不久的未来,是否还会有一个新的全球性的针对粮食问题的解决方案,仍有很多未知数。但是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国际粮食体系的重建,上文中提到的种种限制和粮食体系内部的危机趋势都会发生影响。种种迹象都表明,资本主义以及其国际粮食体系本身都在风雨飘摇之中,在如此情势之下,危机之后,只会是下一个危机。

四、粮食的未来

在进行了上述讨论之后,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能够拥有一种不同的粮食体系,真正解决人类的吃饭问题呢?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先回溯一下为什么在二战后的重建时期,大批发展中国家没能管好自己的饭碗,逐渐丧失了养活自己的能力。

正如文章前面提到的,大批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工业化城市化的要求,需要更多粮食,而美国的廉价粮食也的确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形成了对进口粮食的依赖。这些发展中国家,数量众多,需要在市场上竞争获得粮食,自身又不占据政治或军事的霸权地位,这种进口依赖无异于自己给自己套绳索。

有人可能会说,英国也长期依赖进口,是否管好自己的饭碗似乎没有那么重要。但是,英国是当时

最大的,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资本主义经济体之一。可能英国也是唯一的具有强烈内生动力要求粮食进口的国家。所以英国尽管如同后来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强烈依赖粮食进口,但是当时情况特殊,英国是唯一的大宗买家,又手握世界霸权,其市场权力自不是后来的穷国所能比拟的。

难道发展中国家陷入吃饭难题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些发展中国家还有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呢?历史证明,第二条路是确实存在的,最鲜活的例子就是中国。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靠勒紧裤腰带建设出来的。这里的含义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没有依赖国际粮食体系(美国本身就封锁了中国,所以实际也无从谈起),而是通过农村集体和统购统销制度,将有限的粮食剩余最大化地利用起来,同时通过发挥群众和地方自主性,利用土洋结合的创造性办法,把国家的工业基础逐渐建设起来。这样的工业化道路,有很严格的政治和经济条件,首先,农村需要经历彻底的土地革命,消灭旧的地主阶级和其他反动势力,在农村群众极力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才能够有效地长期地充分动员农业农村的剩余。其次,在城市和工业领域,实行全国范围统筹的科学的规划,这样才能最有效率地开展工业化建设。而这本身也离不开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和全国一盘棋的经济计划体制。中国的发展道路不是没有波折和教训,也并不拒绝参与一定的国际粮食贸易,但是其主线是自力更生。简而言之,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全国人民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国这样的道路是难以走通的。

但是反观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情况则截然不同。这些国家普遍不是由共产党领导革命而获得独立的,这些国家当时的领导阶级有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买办和旧贵族。这些阶级实际上无法通过独立领导土地革命等斗争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但是这些国家依然有发展的需求,那么工业化的粮食从何而来呢?美国提供的廉价粮食正是给了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一个看似取巧的发展办法,也就是无须触及本国的农村生产关系,也无须担心本国的旧农业是否能满足工业化的要求,只需要从国

际粮食体系中购买粮食即可。

在这个意义上,进口依赖和战后粮食体系的建立和维护,其实也是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统治阶级之间的一次合谋。不过,这种取巧的工业化,并不是没有成本的。依靠粮食进口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只会催生出更大的对粮食进口的要求。进口依赖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会一直持续下去。而中国式的发展道路,也付出了很大成本,但是一方面成本由国家内部承担;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农村生产关系理顺了,国家能够掌握自己的饭碗,所带来的经济、政治方面的益处怎么高估也不过分。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能够长期独立于国际粮食体系之外是有基础的。首先是党和政府有明确的认识,要保护自己的饭碗,用各种办法来维护本土的粮食生产。其次,是社会主义的集体土地制度,有效保障了农民的基本生计,也使得稳定的粮食生产有了物质基础。最后,中国体量庞大,国际粮食体系事实上也无法吸纳中国。以2021/2022贸易年度为例,国际市场的大米、小麦和玉米总出口量是大约.5亿吨,而中国光是产量就超过了6亿吨。如果中国自己的生产出了问题,就算把整个国际出口拿来也填补不了中国的需求。更不用说,中国大规模进口粮食,会产生极为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哪怕对于中国,国际粮食市场依然难以完全绕过。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粮食贸易,国际上相对廉价的粮食就可能对中国国内的部分作物产生冲击,比如中国大豆在市场上就不太能跟美国等地的廉价大豆竞争,导致中国极度依赖进口大豆。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的生活水平提高,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像苏联一样,由于要满足国内的生活需要,从而更深度地涉入国际粮食体系。

应该说,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深陷粮食体系之困数十年之后,要摆脱进口依赖的动力是存在的。哪怕不是如中国一样曾经保持独立,只要能普遍地实现相对更多的自力更生,整个国际粮食问题都会出现明确的改善。实事求是地说,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的大部分国家,发展粮食和其他物品的互通有无是正常的要求。陷入危机的只是资本主义

历史上发展起来的国际粮食体系。而在这个体系本身陷入困局的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构想一个不同的粮食体系。况且粮食这样的人类基本的生活和生产资料,本来也不应该掌握在国际资本手中。

这样一个新的粮食体系,至少应该满足下面两点要求。首先,粮食生产应该更多地面向本地的需求,也更多地满足生态可持续的要求。每个国家都可以按照其自身的条件发展粮食生产,这当然并不是说每个国家都要自给自足,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确有大量增产的潜力可挖。这种挖掘潜力的改革实际上要求进行农村生产关系的改良来保护和鼓励普通农户和合作社,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重建各国的本土粮食和农业生产。这里并不是说需要重复中国的土地革命和集体化,而是需要切实改善生产者处境的农业农村政策。其次,新粮食体系里不仅生产要有计划,消费也同样要有计划,而且计划应该以可持续为标准,统筹不同地区的要求、不同发展阶段的要求,以及当代和未来长期的要求。比如在生产当中,要着力探索减少化石能源消费的道路,比如增加轮作、覆盖作物以及粪肥施用。^④又比如在消费上,不能在世界各地盲目复制以肉类为基础的美式食谱,因为美式食谱比起传统食谱要消耗多得多的能量、土地和水资源,在长期本来就是不可持续的。^⑤

中国及其他主要的有意愿进行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在这种世界性的转型中发挥领导性作用。中国一方面有丰富而长期的农村农业发展经验,实际上能够摆脱国际粮食体系的影响而发展自己的经济,完全可以把这一套办法进行推广;另一方面,中国本来就长期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推进了“一带一路”项目在世界多国的展开。现有的聚焦往往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农业重建与国家粮食生产能力的培育等方面的空间依然很大,而且可能在相对投入不大的前提下可以比较切实地改进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生活和国家抗风险能力。

五、总结

本文从历史和现实角度梳理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粮食问题,并分析了国际粮食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根据这些分析,尽管从19世纪中期开始形成以来,国际粮食体系经过了多次大的调整 and 变化,但是其根

本运作规则是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不合理的国际劳动分工的,而其内在危机趋势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显而易见,这样的体系不能作为一个解决人类吃饭问题的可靠办法。

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二条就是到2030年时消除饥饿。可是,目前看起来实现这个目标希望还很渺茫,因为哪怕是新冠疫情冲击前的2019年,世界上仍然有将近7亿人处于饥饿中。现在地缘政治争端一起,全球经济前景黯淡,而且目前国际粮食体系也处于危机中,且没有明确的稳定迹象。

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我们完全能够设想一种新的道路,或者说一种不同于过去的资本主义粮食体系的全球性方案。这种道路在理论上需要进行农村生产关系改革以惠及大量普通生产者和合作社,提高针对本国本地区消费而进行的粮食生产,也需要注意生态可持续原则,对生产和消费都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这条道路从本质上说是趋向社会主义的。尽管这样的变化听起来或许颇为宏大,但是历史已经有力地证明了,不变革旧的粮食体系是不行的。世界大势,浩浩荡荡,探索一条新的解决人类吃饭问题的道路,是我们所有人面临的问题。而中国的宝贵经验,完全可能而且应该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和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61-504页。

②基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计算,数据来源:www.fao.org/faostat。

③Vincent Ricciardi, Navin Ramankutty, Zia Mehrabi, Larissa Jarvis and Brenton Chookolingo, "How Much of the World's Food Do Smallholders Produce?", *Global Food Security*, no. 17(2018), pp. 64-72; Sarah K. Lowder, Marco V. Sánchez and Raffaele Bertini, "Which Farms Feed the World and Has Farmland Become More Concentrated?", *World Development*, no. 142(2021), p. 105-455.

④Harriet Friedman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od: A Global Crisis", *New Left Review*, no. 197(1993), pp. 29-57; Harriet Friedman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o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Food Ord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no. 88(1982), pp. S248-S286; Philip McMichael, "A Food

Regime Genealogy",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36, no. 1 (2009), pp. 139-169; Henry Bernstein, "Agrar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Modern World Capitalism: The Contributions of Food Regime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43, no. 3(2016), pp. 611-647; Zhun Xu, "Food Dependency and Global Food Crisis",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 9, no. 2(2019), pp. 269-281; 许准:《粮仓或是粮荒——走出两百年来的国际粮食体系》,《读书》2022年第6期。

⑤Robert Allen, "Tracking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52, no. 2(1999), pp. 209-235.

⑥Utsa Patnaik, "Global Capitalism, Deflation and Agrarian Crisi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vol. 3, no. 1-2(2003), pp. 33-66.

⑦Gregory Clark, "Yields Per Acre in English Agriculture, 1250-1860: Evidence from Labour Input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44, no. 3(1991), pp. 445-460.

⑧恩格斯:《英国谷物法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63-568页。

⑨Mette Ejrnæs, Karl Gunnar Persson, and Søren Rich, "Feeding the British: Convergence and Market Efficiency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Grain Trade",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61, no. s1(2008), pp. 140-171.

⑩B. R. 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29-232.

⑪B. R. 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722-724.

⑫Enzo R. Grilli and Maw Cheng Yang, "Primary Commodity Prices, Manufactured Goods Prices, and the Terms of Trad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hat the Long Run Shows",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2, no. 1(1988), pp. 1-47.

⑬D. John Shaw, *World Food Security: A History since 1945*,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07.

⑭B. M. Patenaude, "Food as a Weapon", *Hoover Digest*, no. 1(2007), <http://www.hoover.org/research/food-weapon>, November 1, 2023.

⑮Bill Winders, "The Vanishing Free Market: The Formation and Spread of the British and US Food Regimes",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vol. 9, no. 3(2009), pp. 315-344.

⑯Harriet Friedman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od: A Global Crisis", *New Left Review*, no. 197(1993), pp. 29-57; Harriet Friedman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o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Food Ord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no. 88(1982), pp. S248-S286.

⑰ Linda J. Cook, *The Soviet Social Contract and Why It Failed: Welfare Policy and Workers' Politics from Brezhnev to Yeltsi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62.

⑱ David J. Sedik, "A Note on Soviet Per Capita Meat Consumption",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vol. 35, no. 3(1993), pp. 39-48.

⑲ CIA, "The Nutrient Content of the Soviet Food Supply", http://www.foia.cia.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_conversions/89801/DOC_0000498133.pdf, 1984, November 1, 2023.

⑳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计算, www.fao.org/faostat。

㉑ USDA, "Grain: World Markets and Trade", Washington, DC, 2022.

㉒ Derek Headey and Shenggen Fan, *Reflections on the Global Food Crisis: How Did It Happen? How Has It Hurt? And How Can We Prevent the Next One?*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2010; Fred Magdoff, "The World Food Crisis: Sources and Solutions", *Monthly Review*, vol. 60, no. 1(2008), pp. 1-15.

㉓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1, <http://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html>, November 1, 2023.

㉔ USDA, "Grain: World Markets and Trade", Washington, DC, 2012; USDA, "Grain: World Markets and Trade", Washington, DC, 2022.

㉕ O. Liefert, W. Liefert and E. Luebehusen, "Rising Grain Exports by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Region Causes and Outlook", *ERS / USDA Outlook WHS-13A-01*(2013).

㉖ David Pimentel, "Reducing Energy Inputs i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ystem", *Monthly Review*, vol. 61, no. 3(2009), pp. 92-101.

㉗ Henry W. Kindall and David Pimentel, "Constraints on the Global Food Supply", *Ambio* 23(1994).

㉘ Karl Russell and Danny Hakim, "Broken Promise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9, 2016,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6/10/30/business/gmo-crops-pesticides.html>, November 1, 2023.

㉙ Peter Ho, Jennifer H. Zhao and Dayuan Xue, "Access and Control of Agro-Biotechnology: Bt Cotton, Ecological Change and Risk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36, no. 2(2009), pp. 345-364.

㉚ Natasha Gilbert, "A Hard Look at Gm Crops", *Nature*, vol. 497, no. 7447(2013), p. 24.

㉛ David Pimentel, "Reducing Energy Inputs i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ystem", *Monthly Review*, vol. 61, no. 3(2009), pp. 92-101.

㉜ David Pimentel and Marcia Pimentel, "Sustainability of Meat-Based and Plant-Based Diet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vol. 78, no. 3(2003), pp. 660S-663S.

The Crisis and Restruction of the Global Food System

Xu Zhun

Abstract: As the most basic means of life and production in human society, food has played a fundamental role 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historical food problems in the modern world and uses historical data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to analyzes the causes and impacts of several major global food market crises since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with a focus on highlighting the concept of the international food system. The food system includes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 relationship of food, which is subordinate to the overall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is accompanied by the crisis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food system. This process has never addressed the global food problem and will be unlikely to do so in the future. The world needs to explore new sustainable food solutions, and China can provide valuable experience of self-reliance.

Key words: food crisis; food system; capitalism